

# 植物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冯广平

北京自然博物馆, 北京 100050

E-mail: plantculture@sina.com

2013-04-11 收稿, 2013-08-08 接受

**摘要** 将“植物文化”定义为“人类和植物的选择关系和协同演化, 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以植物为载体和诱因的成果类型和行为方式”, 并确定其 7 个方面的研究内容. 回顾了过去 30 年植物文化研究在植物命名、食用选择、药用选择、观赏选择、崇拜选择等 5 个方面取得的重要进展. 植物命名方法, 在植物名称古今对照、中拉对照方面成就较大. 食用选择主要在食用原植物考证、果蔬栽培史和栽培作物起源等方面有进展. 药用选择的成就主要是中药和民族药的原植物考证. 观赏选择则在花文化、园林植物、经典名物考证、古树名木研究等 4 个方向均有进展. 崇拜选择主要在礼制植物、宗教植物、民俗植物有一定的研究成果. 植物文化研究面临文化复兴的机遇, 资源雄厚, 有望在各个方面取得方法突破和成果创新.

## 关键词

植物文化  
植物命名  
食用选择  
药用选择  
观赏选择  
崇拜选择

植物文化(plant culture)是一个新兴的研究方向, 其相关的概念有土著植物学(aboriginal botany)、人文植物或民族植物学(ethnobotany)、文化印痕树(culturally modified tree)、木文化(wood culture)、古代人文植物学(paleoethnobotany)、考古植物学(archeobotany)、森林文化(forest culture)、树木文化(tree culture)等. 民族植物学的概念最早由美国人 Harshberger<sup>[1]</sup>提出, 主要研究土著民族使用和贸易的植物状况. 1978 年, 美国人 Ford<sup>[2]</sup>发展了民族植物学定义, 强调研究人与植物的直接交互作用, 使“民族植物学”成为独立学科. 20 世纪 70 年代, 欧美学者开始关注古代的人类与植物相互作用关系. Renfrew<sup>[3]</sup>定义“古代人文植物学”为“存在于考古范围内的, 曾被人类栽培或利用过的植物的研究”. Ford<sup>[4]</sup>指出, “考古植物学涉及的仅是植物材料发现与鉴别的特殊性, 而不是原理的特殊性”. 古代人文植物学强调人和植物的作用关系和共同演化; 而考古植物学则强调植物自身的发展演化. 显然前者的研究目标更倾向于用植物材料复原古代人类生活方式, 解释古代文化

的发展过程. 正因如此, 赵志军<sup>[5]</sup>强调将古代人文植物学称作“植物考古”. 20 世纪 70 年代末, 美国学者提出了“致幻植物”的概念, 指世界各地巫术或宗教中用于通灵和疗病的、能引起人感觉变化的植物<sup>[6]</sup>. 20 世纪 80 年代初, 欧美学者提出了“文化印痕树”的概念, 指原著民依照传统的森林利用方式, 有目的地修整后的树<sup>[7]</sup>. 2000 年以后, 日本学者提出了“木文化”的概念, 研究人类使用和加工木材而产生的文化现象<sup>[7]</sup>. 很明显, 致幻植物、文化印痕树、木文化均是研究人和植物之间的相互作用.

我国学者较早关注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植物的多样性有较为密切的相关关系, 提出多种与植物相关的文化概念. 蔡登谷<sup>[9]</sup>为森林文化是指人与森林建立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融合关系, 并由此而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总和. 裴盛基<sup>[10]</sup>提出“民族植物学以植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协同演化关系为主线, 研究人类利用植物的文化行为与实践过程, 及其对植物物种和生态系统的影响”. 冯广平等人<sup>[11]</sup>认为, 树木文化的主体是人类, 客体是植物,

**引用格式:** 冯广平. 植物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科学通报, 2013, 58(增刊 I): 1-8

Feng G P. Review and progress of research on plant culture (in Chinese). Chin Sci Bull (Chin Ver), 2013, 58(Suppl.1): 1-8, doi: 10.1360/tb-2013-suppl019

其主要内容是以树木为载体或诱因,人类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其物质内涵包括古树名木、地标风景、园林造景、盆景艺术等4个方面,其精神内涵包括图腾崇拜、礼制元素、比德通感、诗文典故、民俗传统、科学研究等6个方面.上述诸概念的交集为人和植物的相互作用关系,其内核为选择与被选择关系.因为,植物是整个地球生命圈层的基础,人类是生命圈层的一部分,人类因为自身需要而选择有限的植物种类并与其协同演化.故此,本文倾向于将这种相互作用关系作为植物文化研究的主体内容.换言之,植物文化是指人类和植物的选择关系和协同演化,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以植物为载体和诱因的成果类型和行为方式.由于人和植物都存在时空变化,植物文化也因此而具有时空变化特征.

植物文化研究的人和植物的选择关系以及人与所选择植物间的协同演化关系主要表现为:(1)植物命名,即为植物命名,以区分类型;(2)食用选择,指以植物为食,驯化栽培特定的植物类型,以实现其品质和数量的优化;(3)药用选择,指以植物为原材料炮制药物,治疗疾病,还包括用植物本身或其衍生物作香料;(4)用材选择,主要是指用木材建造木构建筑、家具、乐器、车具、桥梁等;(5)赏阅选择,主要指对植物姿态、意象的选择,用于园林造景和盆景艺术,也用于诗文、绘画创作;(6)崇拜选择,指植物在原始宗教、礼制、授时、宗教等方面的作为崇拜物或实现崇拜的媒介;(7)生态选择,指人类自觉地保护、维护和建造赖以生存的植物和生态系统.

## 1 研究现状与存在问题

### 1.1 植物命名的研究

植物命名的研究主要解决植物古今和中外名称对照,以及植物名称含义3方面的问题.清末,旅华俄国人 Bretschneider<sup>[12]</sup>最早开始植物古汉语名称的学名(拉丁名)考证.国人开始此项工作则始于胡先骕<sup>[13,14]</sup>,他甚至认为植物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植物训诂.孔庆莱等人<sup>[15]</sup>出版首部有学名和性状描述的植物学辞典.钟观光<sup>[16,17]</sup>最早开始植物训诂的方法学研究;并完成《植物中名考证》稿本,对先秦典籍中的146科植物详细考证,惜书稿毁于抗日战争.陆文郁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考证植物古汉语名,至70年代,完成《植物名汇》手稿27卷,辑录植物古汉名

57038条,学名20498种<sup>[18]</sup>.植物古汉语名考证成果以此为最著,惜未公开发表.经利彬等人<sup>[19]</sup>考证《滇南本草》植物26种,成为较早的植物考据著作.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组织学者对植物的汉语名称和学名进行厘定,编成《种子植物名称》<sup>[20]</sup>,成为植物名称考证的官方定本.夏纬瑛考证了308个植物中文名的本末由来及名称含义,结果大多详确可信<sup>[21]</sup>.高明乾和卢龙斗<sup>[22,23]</sup>考证植物古汉名6183个,隶属324科,1433种,成为当前植物命名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之一.汤彦承和王锦秀<sup>[24]</sup>认为云南高原地区物种剧烈分化,在植物考据时宜采用集合种(species aggregate)或复合种(species complex)来沟通古代植物典籍和现代植物分类体系间的物种对应关系.

### 1.2 植物食用选择的研究

植物食用选择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人 Chaney<sup>[25]</sup>最早研究了周口店北京直立人遗址的巴氏朴(*Celtis barbouri*)的果核形态,确定北京直立人采食巴氏朴.随后,日本人土高桥基将山西万荣荆村遗址出土的谷物鉴定为粟和高粱,一说为黍<sup>[16]</sup>.此后,从文献考证和植物考古两个方面探索作物果蔬等食用植物的原植物考证和栽培起源.

(i) 食用植物的原植物考证.夏成吉<sup>[27]</sup>最早开始谷物的原植物考证.王毓瑚<sup>[28-30]</sup>考证了历代种植的大田作物33种.高明乾等人<sup>[31-34]</sup>系统考证了粮食、豆类、块根(茎)植、粮油兼用植物24属、28种.罗桂环<sup>[35]</sup>考证了茨菇、荸荠、菱、芡等4种水生作物古汉语名及其栽培简史.刘长江等人<sup>[36]</sup>报道了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掘的作物果蔬类型,北方新石器时代遗址有粟、黍、稻、小麦、大麦、栎、榛、栗、桃、杏等,南方新石器时代遗址有稻、芡实、菱角、葫芦、栎、南酸枣、杏、梅等.

(ii) 果蔬栽培史.俞德浚<sup>[37]</sup>和辛树帜<sup>[38]</sup>较早研究了果树资源和果树栽培史.孙云蔚<sup>[39]</sup>、佟屏亚<sup>[40]</sup>系统地考证了常见果树的栽培史.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重要的温带水果如桃、梨、苹果、樱桃等,以及亚热带水果如柑桔、梅、凤梨等的起源和栽培历史都作了较为深入的考证.蔬菜栽培史研究以叶静渊为代表,他曾系统叶静渊<sup>[41-45]</sup>考证了茄果类蔬菜、甘蓝类蔬菜、水生蔬菜、芥菜类、根菜类的品种类型和栽培史,主要是十字花科、茄科和睡莲科种类.

(iii) 栽培作物起源.栽培作物主要集中在稻

(水稻)、黍、稷(谷子)、麦(小麦)、菽(大豆)等“五谷”的起源探索。赵志军<sup>[46,47]</sup>重点研究了栽培稻和稻作农业的起源,认为栽培稻距今 10000 年左右已经形成,初期的稻作生产则出现于距今 9000~7800 年,至距今 7000~5000 年,稻作农业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开始形成。赵志军<sup>[48]</sup>认为,栽培粟最早出现于距今 8000~7500 年,内蒙古赤峰市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出土的栽培粟形态比较原始,属于“似农非农”的种植状态。孔昭宸等人<sup>[49]</sup>依据新疆、青海、西藏等地的考古发现,推测栽培小麦最早出现于距今 4000 年。

### 1.3 植物药用选择的研究

植物药在我国传统中药和少数民族药中比重很大,植物药用选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药和少数民族药原植物的考证。

(i) 中药原植物考证。中药原植物的考证始于 20 世纪 20 年代,伊博恩(Bernard E. Read)和刘毅然最早开始《本草纲目》植物的学名厘定<sup>[50]</sup>。1981~2012 年间,约有 350 余篇中药原植物考证的中文文章发表。其中以祁振声和尚志钧的成就最著,祁振声发表 161 篇,尚志钧发表论文 77 篇。祁振声<sup>[51~53]</sup>对紫金牛属药用植物考证深入,考证出 10 种原植物。尚志钧<sup>[54~61]</sup>最早考释马王堆出土《五十二病方》所载药物的原植物类型。他在历代本草研究方面建树颇多,辑复亡佚本草著作 18 部<sup>[62]</sup>。王年鹤等人<sup>[63~66]</sup>从形态解剖、染色体、花粉、化学成分等方面对比川白芷、杭白芷、祁白芷、禹白芷等 4 种栽培白芷与其 3 个野生近缘种兴安白芷(*Angelica dahurica*)、台湾白芷(*A. dahurica* var. *f. formosana*)、雾灵当归(*A. porphyrocaulis*),确定台湾白芷为栽培白芷的原植物。他的研究突破了以往原植物考证以形态和药性为主要依据的范式,引入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证据,提高了考证结果的可信度。此外,一些学者还注意到中药在不同国家原植物的不同。陈虎彪等人<sup>[67]</sup>考释了中国和日本对 44 种中药的原植物差别,指出中日之间存在原植物类型选择和药用部位选择的差别。

中医古籍的订正和辑佚是与中药原植物考证的重要关联成果。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发表的相关论文 150 篇,重点考释《救荒本草》、《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拾遗》、《植物名实图考》等。林有润<sup>[68]</sup>考证《本草纲目》所载菊科植物 44 属、78 种、2 变种;郝近大和谢宗万<sup>[69]</sup>考释出《本草纲目》收录蓼科植物 6

属、20 种<sup>[69]</sup>。倪金根集成前人研究成果,完成了对《救荒本草》所载 414 种植物的名称、分布地、时间等信息的古今对照工作,考证简约而准确<sup>[70]</sup>。

(ii) 民族药原植物考证和资源普查。民族药研究始于 1982 年。裴盛基<sup>[71]</sup>最早开始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药物的研究。杨永昌<sup>[72]</sup>最早开始蒙古高原地区少数民族药物的研究。此后,少数民族药物选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原植物考证和野生近缘种普查方面,以藏药和蒙药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杨永昌辑录藏药 431 种<sup>[72]</sup>。一些植物基源混乱的藏药类型,通过本草考证和生物化学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其原植物得以厘定,如解吉包括龙胆属 10 个种<sup>[73]</sup>。罗布桑<sup>[74]</sup>系统考证了 400 余种常用蒙药材的原植物。Long 等人<sup>[75]</sup>调查了广西壮族药 329 种、贵州侗族药 157 种、云南德昂族药 92 种。

### 1.4 植物赏阅选择的研究

植物赏阅选择的研究集中在花文化研究、园林植物考证及古树名木研究、儒家经典中植物的考证等方面。

(i) 花文化研究。花文化研究以传统名花如牡丹、梅花、荷花、菊花等的原植物考证和文化内涵探索为主。佟屏亚<sup>[40]</sup>较早考证了梅的果用和观赏简史。陈俊愉<sup>[76]</sup>系统研究了梅花,建立了 3 系、11 品种群、391 品种的梅花分类系统。王莲英<sup>[77]</sup>建立了 3 系、13 品种群、400 余品种的牡丹分类系统。王其超和张言行<sup>[78]</sup>建立了 3 种系、6 群、608 个品种的荷花分类系统。冯广平<sup>[79]</sup>从植物与文史相结合的角度研究了牡丹文化;进而系统研究了梅、月季、菊花、桂花、荷花等传统名花的花文化。

(ii) 古典园林植物考证及植物造景。对古典园林植物选择的研究起步比较晚。关传友<sup>[80]</sup>考证了银杏在历代植物造景中的使用。王璐艳等人<sup>[81]</sup>从唐诗中考证出大明宫的朝堂区植物造景以松、柳、梅、竹等为主,御苑区植物种类繁多。包琰等人<sup>[82,83]</sup>系统考证了秦汉上林苑中栽培的植物 61 科 94 属 116 种,结果表明,上林苑植物以温带植物为主体,热带亚热带植物占有较大比例。王金虎等人<sup>[84]</sup>分析了苏州 8 个古典园林中的植物 56 科 118 种,发现以乡土植物和传统花木为主,反映出师法自然的造园思想。

(iii) 儒学经典名物考证。陆文郁<sup>[85]</sup>最早系统考证了《诗经》中的 132 种植物,对其学名、形态、

产地、用途等考证详确。高明乾等人<sup>[86]</sup>和潘富俊<sup>[87]</sup>分别独立考证了《诗经》中的植物，前者考证为136种，后者考证为135种，考证依据及内容大部吻合，惟过分重视名称训诂，而忽略了对古籍记载中植物性状的提炼和把握。

(iv) 古树名木调查与资源保护。古树名木调查始于1982年[《加强城市和风景名胜区分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的意见》(城发园字第81号)]。卢炯林<sup>[88]</sup>率先完成了河南省的982株古树调查，选择有代表性的古树进行描述，重点收载古树的文献记载及其相关的历史故事；言简意丰，体例规整，成为后出著作的主要参考模式。此后，江西、北京、河北、云南、台湾、陕西、甘肃、浙江、安徽、贵州、香港、重庆、上海、湖南、台湾等省市的古树名木调查相继完成。此外，还有一批城市古树名木也相继出版，且近年来有快速增加的趋势。这些著作大都是图录性质，对古树生物性状、文化内涵、保护措施等关注严重不足。全国绿化委员会描述全国代表性的800余株古树和40多个古树群的历史意义、信仰和民俗，以及古树的自然美、文物性和地域性<sup>[89]</sup>。

## 1.5 植物崇拜选择的研究

植物崇拜选择主要表现为古代礼制的植物选择、宗教的植物选择和民俗的植物选择。

(i) 古代礼制的植物选择。对古代葬制的木材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何天相最早鉴定了甘肃敦煌汉代棺木的木材类型<sup>[90]</sup>。1974年，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出土了迄今最早发现的“黄肠题凑”葬制，黄肠用柏木(*Cupressus* sp.)<sup>[91]</sup>。王树芝<sup>[92]</sup>系统地总结了西周至明代墓葬的木材类型，发现古代葬制的植物选择非常稳定，以梓木和楠木为主，其他常用的植物有松、柏木、圆柏、侧柏、杉木、楠木、樟、檫木、榆、榉、糙叶树、栎、柞木和擎天树等。Wang等人<sup>[93]</sup>分析了秦始皇兵马俑坑棚架的木材类型为冷杉、云杉和铁杉，未发现刻意选择现象。郭风平等人<sup>[94]</sup>分析了古代陵寝的林地类型、树种选择及其规制与信仰。冯广平等人<sup>[95]</sup>将先秦诗礼制度的植物选择分为标志树、纪念树、月令植物、荐熟植物和比德植物等5类。在葬制之外，乐器的材质也有进展。王树芝<sup>[96]</sup>研究了湖北枣阳楚墓出土的6件乐器材质，包括梓、榉、麻栎、苦竹等7种。

(ii) 宗教的植物选择。宗教的植物选择研究

2000年以后才开始。古开弼<sup>[97]</sup>总结了历代以树木为姓氏、族徽、圣物、圣林、护身符等的植物类型及文化现象。教亚丽和张义君<sup>[98]</sup>总结了以莲、娑罗树、菩提树、银杏为代表的佛教植物崇拜产生的原因及其变化。金荷仙和华海镜<sup>[99]</sup>分析了佛寺植物造景的方法以及植物选择的标准，发现其植物选择以佛经植物、长寿植物、香料植物等为主。张丽丽等人<sup>[100]</sup>分析总结了道观常用植物20余类及其寓意。Jiang等人<sup>[101,102]</sup>报道了新疆吐鲁番洋海墓地萨满墓中出土的大麻，并检测出致幻物质四氢大麻酚，成为国内致幻植物的最早报道。

(iii) 民俗的植物选择。对少数民族的植物崇拜研究较早。廖明君<sup>[103]</sup>研究了广西壮族对花、葫芦、竹的崇拜与生殖崇拜的关系，认为植物崇拜的本质在于生殖崇拜。郭淑云<sup>[104]</sup>分析北方萨满教的植物崇拜主要是对桦树和柳树的崇拜。杨期和等人<sup>[105]</sup>认为广东梅州客家人的植物崇拜与食用药用、传说象征和谐音相关。对汉族传统节日中的植物选择研究相对较晚，郭康松<sup>[106]</sup>归纳了清明、端午等节日插柳、戴柳的习俗的时空变化及内容，认为此习俗源自古代植物崇拜和生殖崇拜。关传友<sup>[107]</sup>、纪永贵<sup>[108]</sup>研究了我国的槐树崇拜以及食槐习俗。陈西平<sup>[109]</sup>梳理了梓文化的自然属性和人文内涵。

## 2 未来工作展望

中国的植物学知识经历一个缓慢而扎实的发展过程，没有“欧洲式的”黑暗时代<sup>[110]</sup>。我国的植物学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人文性和实用性。在近代植物科学引入之前，我国的植物学知识主要集中在2个领域：一是集中在正统的儒学和史学典籍以及为其作注解疏证的文献中，文献数量巨大，植物知识异常丰富，这是古代文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自我修养要求所致；二是集中在独立成体系的本草学典籍中。本草著作不但历代重修，而且一般都是全部收录前代的成果，载录的植物远超同时代的世界其他国家。这是我国开展植物文化研究得天独厚的资源。植物文化研究适逢国家文化大发展战略提出的良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很大。2011年，《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布，提出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包括国家重大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建设，以

及民族传统节日文化内涵挖掘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而植物则是其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植物文化的研究有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2012年,首届“植物·文化·环境国际论坛”在我国召开,会议确定了植物演化、植物文化、木文化、本草植物、园林植物和资源保育等6个主题,基本涵盖了植物文化研究的各个方面.未来的植物文化研究有望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突破.

(i) 植物命名方面.古今对照、中文拉丁文对照仍然是工作的重点,在考证依据和考证方法两方面都需要提升.在文献记载外,更需重视植物地理、考古材料、植物化学和植物分子等实物材料的搜集与比照.在考证方法上以原植物考证为中心,除植物形态方法外,还应兼顾训诂学、音韵学、民俗学等方法的综合使用.此外,植物的中文名、拉丁文名原义的考证也是需要加强的一个方面.

(ii) 植物食用选择方面.传统农产品的多样性和农作物起源是研究重点.当前,果蔬作物品种单一、外来品种多的现象非常普遍,与平衡营养理论相悖,导致许多营养性疾病.这一状况的改善依赖于传统果蔬作物的多样性产品挖掘和培育,而其工作的前提是传统果蔬作物的原植物考证.这方面的工作虽然基础性强,但意义重大.稻、粟、黍、大豆、荞麦、大麻都被认为起源于中国,除稻和粟的起源已经获得共识外,其他几种作物的起源时间和地点有赖于更多、更深入的工作开展.

(iii) 植物药用选择方面.中药原植物的考证更加注重使用植物地理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等相关学科证据,结果的可信度在加大.植物自身的功效和人们因此而形成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文化的两个侧面,在用科学方法提炼植物实用效能的同时,还要注意与之并存的生活方式的总结与推广.

(iv) 植物的用材选择方面.目前木文化研究以日本为领先,我国学者需要加强与日本学者的合作,共同开展木构建筑、佛道造像、木作文化的研究.2011年,美国成立了以旅美中国学者为主体的国际木文

化学会(International Wood Culture Society, IWCS),为木文化研究提供更开阔的平台,有望取得更多成果.

(v) 植物观赏选择方面.(1)我国传统的花卉文化深厚而广博,目前的研究无论是在花木种类数量还是在其文化内涵挖掘的深度上都明显不足,未来应在植物类型和文化内涵两方面加大研究纵深.《初学记》、《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群芳谱》、《花镜》等集中记载花木种类和文化的著作,需要在原植物考证、文字训诂和校注、英译版本等方面的工作.(2)我国古典园林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其植物造景艺术的发掘目前尚不能冰山一角.古典园林植物造景的植物类型选择及其成因研究是诠释“世界园林之母”称号的重要路径.古树往往是古代园林的活遗存,通过对古树的种类、年轮、土壤孢粉等信息的提取恢复和重建古典园林景观,是可行的,也是可信的.(3)名物考证,主要是儒家经典的原植物考证,是理解我国传统诗礼文化和民族心理的钥匙.除应关注植物类型外,还需重视植物的时间和空间变化,以及其成因的探究,进而摸索不同时空内,植物的赏阅选择规律.

(vi) 植物崇拜选择方面.植物的考证要和古代诗礼制度起源结合起来,这方面取得突破一方面依赖于考古发掘的收获,另一方面依赖于植物遗存检测方法的革新.原始宗教和自然崇拜在少数民族分布地区有大量至今仍存的物质和非物质的遗存,如壮族的竜林、傣族的龙林崇拜等,对这些遗存的成因探索,不仅能为宗教起源提供证据,也能为古代礼制起源提供旁证.佛、道、景教等对植物的选择不仅表现在园林造景方面,在木构建筑、木造像、香料等方面均有体现,对这些材料的深入研究有助于完整而深刻地理解宗教的植物选择.

最后,植物文化研究能够发掘出被时间证明是有效的人与植物的共生关系,能够摸索出人类适应自然、管理自然的规律性的东西,这些成果对于解决当前世界所面临的生态危及和全球变化有借鉴意义.

致谢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0370237, 31070184)以及国家基本药物所需中药原料资源调查和检测(HBZYZYPC-03)资助.

## 参考文献

- 1 Harshberger J W. The purpose of ethnobotany. Bot Gaz, 1896, 21: 146-158

- 2 Ford R I. Ethnobotany: Historical diversity and synthesis. In: Ford R I, ed. The Nature and Status of Ethnobotany. Anthropol Papers, No.67.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useum of Athropology, 1978. 33-50
- 3 Renfrew J. Paleoethonobotany: The Prehistory Food Plants of the Near East and Europ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3
- 4 Ford R I. Paleoethnobotany in american archeology. In: Schiffer M, ed. Advances in Arch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Vol.2).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9. 286-336
- 5 赵志军. 植物考古学概述. 农业考古, 1992, (1): 26-30
- 6 Schultes R E, Hofmann A, Ratsch C. Plants of the Gods: Their Sacred, Healing and Hallucinogenic Power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 7 Stryd A H, Eldridge M. CMT Achaeology in British Columbia: The Meares Island Studies. B.C. Studies, 1993, (99): 184-234
- 8 伊東隆夫. シルクロードと木の文化. 山林, 2003, (1428): 35-43
- 9 蔡登谷. 森林文化初论. 世界林业研究, 2002, 15(2): 12-18
- 10 裴盛基. 中国民族植物学研究三十年概述与未来展望.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1, 20(2): 5-9
- 11 冯广平, 包琰, 赵建成, 等. 北京皇家园林树木文化图考.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2. 4-44
- 12 Bretschneider E. On the Study and value of Chinese Botanical Works, with Notes on the History of Plants and Geographical Botany from Chinese Sources. Illustrated with 8 Chinese Wood cuts. Foochow: Rozario, Marcal & Co., 1871
- 13 胡先骕. 《说文》植物古名今证. 科学, 1915, 1: 666-671, 789-791
- 14 胡先骕. 《说文》植物古名今证. 科学, 1916, 2: 311-317
- 15 孔庆莱, 杜就田, 莫叔略, 等. 植物学大辞典.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18
- 16 钟观光. 论植物邦名之重要及其整理法. Sinensia, 1932, 13: 1-8
- 17 钟观光. 科学名词审查会植物学名词审查本植物属名之校订. Sinensia, 1932, 13: 9-52
- 18 陆惠元. 草木有缘潜心人——记陆文郁先生. 植物杂志, 2000, (3): 36-38
- 19 经利彬, 吴征镒, 匡可任, 等. 《滇南本草图谱》第一集. 昆明, 1945
- 20 中国科学院编译室. 种子植物名称.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4
- 21 谭宏姣, 夏玮瑛. 《植物名释札记》补正. 自然科学史研究, 2005, 24: 364-371
- 22 高明乾, 卢龙斗. 植物古汉名图考.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6
- 23 高明乾, 卢龙斗. 植物古汉名图考续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3
- 24 汤彦承, 王锦秀. 在植物考据研究中应用进化思想的探讨. 云南植物研究, 2009, 31: 406-407
- 25 Chaney R. The food of Peking Man. New Ser Bull, Carnegie Instit Washington, 1935, (3): 197-202
- 26 黄其煦. 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农耕文化中的作物——关于农业起源问题的探索. 农业考古, 1982, (2): 55-61
- 27 夏成吉. 五谷考. 中华农学会丛刊, 1919, 1(2): 1-4
- 28 王毓瑚. 我国自古以来重要农作物. 农业考古, 1981, (1): 13-20
- 29 王毓瑚. 我国自古以来重要农作物(中). 农业考古, 1981, (2): 79-89
- 30 王毓瑚. 我国自古以来重要农作物(下). 农业考古, 1982, (1): 42-49
- 31 高明乾, 刘素婷. 粮食作物古汉名训诂(一).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4, 32: 87-89
- 32 高明乾, 王凤产, 刘坤, 等. 粮食作物古汉名训诂(二).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5, 33: 102-105
- 33 高明乾, 刘素婷, 王凤产, 等. 粮食作物古汉名训诂(三).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6, 34: 110-112
- 34 刘素婷, 刘坤, 高明乾. 粮食作物古汉名训诂(四).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8, 36: 90-93
- 35 罗桂环. 茨菇等几种水生作物栽培史考. 古今农业, 2005, (1): 26-34
- 36 刘长江, 靳桂云, 孔昭宸. 植物考古: 果实和种子研究.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8
- 37 俞德浚. 我国果树资源的地理分布. 园艺学报, 1962, 1: 2-14
- 38 辛树帜. 中国果树历史的研究. 北京: 农业出版社, 1962
- 39 孙云蔚. 中国果树史与果树资源. 上海: 上海科技出版社, 1983
- 40 佟屏亚. 果树史话. 北京: 农业出版社, 1983
- 41 叶静渊. 我国茄果类蔬菜引种栽培史略. 古今农业, 1983, (2): 37-42
- 42 叶静渊. 甘蓝类蔬菜在我国的引种栽培和演化. 自然科学史研究, 1986, 5: 247-255
- 43 叶静渊. 我国水生蔬菜栽培史略. 古今农业, 1992, (1): 13-22
- 44 叶静渊. 我国古代芥菜类的演化与栽培. 古今农业, 1993, (4): 37-42
- 45 叶静渊. 我国根菜类栽培史略. 古今农业, 1995, (3): 48-56, 81; (4): 45-50
- 46 Zhao Z J, Pearsall D M, Benfer R A, et al. The Middle Yangtze region in China is one place where rice was domesticated: Phytolith evidence from the Diaotonghuan Cave, Northern Jiangxi. (Special Section: Rice Domestication). Antiquity, 1998, 72(278): 885-897
- 47 赵志军. 栽培稻与稻作农业起源研究的新资料和新进展. 南方文物, 2009, (3): 59-63

- 48 赵志军. 从兴隆沟遗址浮选结果谈中国北方旱作农业起源问题. 见: 东亚古物(A卷).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5
- 49 孔昭宸, 刘长江, 张居中, 等. 中国考古遗址植物遗存与原始农业. 中原文物, 2003, (2): 4-9, 13
- 50 Read B E. Chinese materia medica, animal drugs from the *Pen Ts'ao Kang Mu* by Li Shih-chen, A.D. 1597. Peking Nat Hist Bull, 1931, 4: 1-102
- 51 祁振声. 紫金牛原植物考辨. 河北林果研究, 1992, 7: 41-46
- 52 祁振声. 对《紫金牛属中药原植物的本草考证》一文的商榷. 中药材, 1999, 22: 39-41
- 53 祁振声, 杨华生. 紫金牛属四种中药及叶底红本草考证. 中药材, 1997, 20: 39-41
- 54 尚志钧. 《五十二病方》药物考释. 中成药, 1985, (1): 31-32
- 55 尚志钧. 《五十二病方》“攻口、(木)摩、产齐赤”考释. 中成药, 1985, (3): 42
- 56 尚志钧. 《五十二病方》“葶藶”、“毒藶”、“苦”、“仆藶”考释. 中药材, 1986, (6): 45-46
- 57 尚志钧. 《五十二病方》药物厚附、朴、白付考释. 中药材, 1987, (2): 49-50
- 58 尚志钧. 《五十二病方》百草末、屋荣蔡、禾、陈稿、荆箕药物考释. 中药材, 1987, (3): 45, 32
- 59 尚志钧. 《五十二病方》药物(前中)根、笱莫、葶夷考释. 中药材, 1988, 11: 43-44
- 60 尚志钧. 《五十二病方》药物“蒿、青蒿、白蒿”考释. 中药材, 1988, 11: 42
- 61 尚志钧. 《五十二病方》“五谷、米、谷汁、泽泔、黍潘”考释. 中药材, 1989, 12: 43-44
- 62 陶国水, 倪根根, 赵怀舟. 尚志钧教授本草文献研究述要. 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8, (2): 4-8
- 63 王年鹤, 秦慧贞, 黄璐琦, 等. 中药白芷的基原植物研究 I. 中药白芷及其野生近缘植物的形态解剖. 中国中药杂志, 2001, 26: 529-533
- 64 王年鹤, 秦慧贞, 舒璞, 等. 中药白芷的基原植物研究 II. 中药白芷及其野生近缘植物的染色体核型和花粉形态. 中国中药杂志, 2001, 26: 584-588
- 65 王年鹤, 谷口雅彦, 杨滨, 等. 中药白芷的基原植物研究 III. 中药白芷及其野生近缘植物的香豆素类成分比较. 中国中药杂志, 2001, 26: 669-671
- 66 王年鹤, 黄璐琦, 杨滨, 等. 中药白芷的基原植物研究 IV. 白芷的基原植物、栽培历史以及其近缘野生植物演化的讨论. 中国中药杂志, 2001, 26: 733-736
- 67 陈虎彪, 蔡少青, 御影雅幸, 等. 中药与日本汉方药原植物的差异比较及原因分析. 中国中药杂志, 2004, 29: 715-718, 822
- 68 林有润. 《本草纲目》菊科植物考. 植物研究, 1996, 16: 405-412
- 69 郝近大, 谢宗万. 《本草纲目》中蓼科药物基原考. 中国中药杂志, 1999, 24: 439-442
- 70 明·朱橚, 著. 倪根金, 校注. 救荒本草校注. 台北: 宇河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2010
- 71 裴盛基. 西双版纳民族植物学的初步研究. 见: 中国科学院云南热带植物研究所, 主编. 热带植物研究论文报告集.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2. 16-32
- 72 杨永昌. 藏药志.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1
- 73 Zhao Z L, Gaawe D, Wang Z T. Identification of medicinal plants used as Tibetan Traditional Medicine Jie-Ji. J Ethnopharmacol, 2010, 32: 122-128
- 74 罗布桑. 蒙药学.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9
- 75 Long C L, Wang Y, Zhao F, et al. Ethnobotanical and phytochemical studies of medicinal plants of minority groups in southern China. Planta Med, 2012, 78: 1292-1292
- 76 陈俊愉. 中国梅花品种图志.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2010. 49-187
- 77 王莲英. 中国牡丹品种图志.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1997. 1-48
- 78 王其超, 张言行. 中国荷花品种图志.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2005
- 79 冯广平. 惟有牡丹真国色. 科技智囊, 2007, (5): 76-82
- 80 关传友. 中国园林银杏造景史考. 古今农业, 1998, (1): 39-44
- 81 王璐艳, 丁超, 刘克成. 诗考唐代大明宫的园林植物. 中国农学通报, 2011, 27: 250-25
- 82 包琰, 冯广平, 赵建成, 等. 秦汉上林苑栽培树木初考. 农业考古, 2011, (4): 273-292
- 83 冯广平, 包琰, 赵建成, 等. 秦汉上林苑植物图考.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2
- 84 王金虎, 蒋霞, 王桃云, 等. 苏州古典园林中的植物. 安徽农业科学, 2006, 34: 886-887, 889
- 85 陆文郁. 诗草木今释.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57
- 86 高明乾, 佟玉华, 刘坤. 诗经植物释诂.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2
- 87 潘富俊. 诗经植物图鉴.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
- 88 卢炯林. 河南古树志. 郑州: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8
- 89 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 中华古树名木(上、下册). 北京: 中国大地出版社, 2007
- 90 王树芝. 考古遗址木材分析简史. 南方文物, 2011, (1): 156-162

- 91 大葆台汉墓发掘组,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大葆台汉墓.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9
- 92 王树芝. 西周至明代木质葬具用材的初步分析. 南方文物, 2013
- 93 Wang Q, Zhang Z L, Ding H, et al. The wood in the pits of terracotta figures and its architectural application. *J Archeol Sci*, 2009, 36: 555–561
- 94 郭风平, 安鲁, 任耀飞, 等. 中国古代陵寝树木文化整理研究.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9: 1–6
- 95 冯广平, 赵志军, 包琰, 等. 先秦诗礼制度与植物文化初论. 见: 东方设计学院, 主编. 2011年海峡两岸植物文化与地区观光休闲产业经营管理研讨会论文集. 新北: 华立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2011. 19–26
- 96 王树芝. 古代乐器的材质——湖北枣阳九连墩楚墓出土木材分析(一)、(二). 中国文物报, 2012年2月3日, 第6版, 第7版
- 97 古开弼. 中华民族的树木图腾与树木崇拜. 农业考古, 2002, (1): 136–153
- 98 教亚丽, 张义君. 植物与佛教(上)、(下). 植物杂志, 2000, (2): 25–26; (3): 24–25
- 99 金荷仙, 王海镜. 寺庙园林植物造景特色. 中国园林, 2004, (12): 50–56
- 100 张丽丽, 王立君, 吴同强. 道观园林植物景观营造初探. 中国农学通报, 2009, 25: 283–287
- 101 Jiang H E, Li X, Zhao Y X, et al. A new insight into *Cannabis sativa* (Cannabaceae) utilization from 2500-year-old Yanghai Tombs, Xinjiang, China. *J Ethnopharmacol*, 2006, 108: 414–422
- 102 Russo E B, Jiang H E, Li X, et al. Phytochemical and genetic analysis of ancient *Cannabis* from Central Asia. *J Exp Bot*, 2008, 59: 4171–4182
- 103 廖明君. 植物崇拜与生殖崇拜——壮族生殖崇拜文化研究(中).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5, (2): 26–31
- 104 郭淑云. 萨满教动植物崇拜与生物认知.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30: 41–43
- 105 杨期和, 杨和生, 陈丽青, 等. 梅州客家人植物崇拜的调查研究——以五华县为例. 安徽农业科学, 2010, 38: 21091–21097, 21106
- 106 郭康松. 戴柳、插柳风俗考论.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 29: 57–61
- 107 关传友. 论中国的槐树崇拜文化. 农业考古, 2004, (1): 79–84
- 108 纪永贵. 槐树的实用功能与文化象征.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5: 1–7
- 109 陈西平. 梓文化考略.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9: 13–17
- 110 Needham J.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ume 6: Biology and Biological Technology Part I*.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Review and progress of research on plant culture

FENG GuangPing

*Beijing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Beijing 100050, China*

The term “plant culture” is defined as the selection and coevolution of mankind and plants, as well as the resulting material wealth, and the behavioral influence of plants. The research of plant culture includes seven areas: plant nomenclature, their use as food, medicine, wood, the appreciation of plants, their use as symbols, and ecology. Here, the research in five of these areas (plant nomenclature, food, medicine, appreciation, and symbols) over the last 30 years is reviewed. The major achievement in plant nomenclature has been exegetics from ancient Chinese names to current and Latin nomenclature. The research in plant selection for food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in the fields of original plants used as crops, the cultivation history of vegetables and fruits, and the origin of crops. The study of plant selection in medicine has made progress in the use of original plan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ethnobotany. The research in plant selection for the appreciation of plants, including floristic culture, ornamental plants, plant exegetics of Chinese classics and ancient trees, ha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As for plant selection as symbols, there is some progress in the use of plants in rites, religion and customs. The research of plant culture will aid the cultural renaissance strategy sponsor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s well as the cultural resources. It is expected that there will be much future progress in each of these research areas.

**plant culture, plant nomenclature, food, medicine, appreciation, symbol**

doi: 10.1360/tb-2013-suppl019